

会员通讯

2015年第9期

(总第53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5年10月30日

目 录

工作动态

- 第二届“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在京召开 (2)
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在京召开 (3)
国经中心举办第75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5)

权威言论

- 曾培炎：在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上的致辞 (6)
魏礼群：建设专业化高质量社会智库 (9)
郑新立：以全面小康为目标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18)
魏建国：金砖新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亚投行相互合作补充 (23)
成果摘要 (26)
国际交流 (31)

[工作动态]

第二届“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在京召开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9月23日在北京召开。9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了来华参加论坛的新西兰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部长乔伊斯参加会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出席论坛开幕式。来自中新两国政府、工商界、科教文化界的高层人士近120人参加论坛。此次论坛以“携手合作 走向成功”为主题，就食品安全、旅游、人文交流、投资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张晓强在会上指出，近年来，中新友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不断，人文交流增强，双边贸易去年达到历史新高，双向投资也持续发展。中国将进一步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对外投资将保持强劲增长，中新双方应发挥各自潜力，提升中新投资合作水平。

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麦金农在开幕式上表示，新西兰高度重视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加强政治、经贸、科教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双边食品、旅游、人文、投资领域的合作，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2013年4月12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该论坛目的是通过汇聚中国与新西兰高层人士力量，推动中新双边和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完）

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在京召开

10月2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会议以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关注点——“可持续性”作为主题，着眼于中国整体宏观范畴，透视京津冀地区所面临的能源挑战以及可推行的重点解决方案，对中国实现经济转型、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出席会议并致辞。中方代表认为，中国可持续性行动应重视三个方面。一是将可持续性作为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抓住环境治理和保护这一重要环节，重点治理雾霾、污水等突出问题。二是将可持续性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指标，在扶贫开发中不仅要重视总量，更要注重成本、收入、环境与民生。三是京津冀应率先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实效，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环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聚焦生态环境，共建共保。

会议设置了CEO论坛、京津冀论坛和专家论坛等。来自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政府代表，能源企业、能源领域专家和学者，围绕可持续领域商业投资与合作、筑建京津冀地区在转型中的领先地位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减少碳排放并推进可持续化、促进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建筑行业能源效率与节能利用等主题展开研讨。

会上，保尔森基金会发布了《中国的新机遇：可持续的经济转型》报告，保尔森基金会气候与可持续城市化项目副主席成可黛介绍了报告的主要观点及见解。此外，会上展示了可持续发展规划奖的获奖项目和优秀项目。

会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会见了保尔森一行。

国经中心举办第 75 期经济每月谈

2015 年 9 月 21 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办第 75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中蒙俄经济合作进程及展望”。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执行局常务副主任魏建国主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李罗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石泽、新华社前驻蒙古国首席记者吕国栋分别发表演讲。

李罗莎表示，新世纪以来，中蒙俄在北亚区域已有的良好经济合作，打造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石泽指出，当前，中蒙俄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时期，只有建立比较扎实、良好、稳定的中俄关系，中俄经贸合作才能成为推进中俄蒙走廊建设的良好基础与支撑。吕国梁认为，中蒙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投资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政府应极大对蒙古国投资的企业培训，提高“走出去”企业人员素质，加强企业财务审计，提高我国企业“走出去”水平和质量。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权威言论]

在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 可持续性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尊敬的保尔森主席，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本次会议将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关注点——“可持续性”作为主题，对中国实现经济转型、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与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借此机会，结合中国下一个五年的几项工作重点，简要谈谈我对中国可持续性行动的几个看法：

第一，可持续性应成为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中国虽然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面临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企业成本上升等诸多挑战，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必须转变发展的驱动模式，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方式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它

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点来予以推进。加强环境治理和保护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雾霾和污水是当前中国城市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可以此为切入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这就需要大力推动节能减排，重塑行业相关标准，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倒逼企业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创新步伐，扩大清洁绿色生产模式，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统筹考虑服务业发展。这些都有利于城市经济转型，提升可持续性。

第二，扶贫开发应将可持续性作为重要指标。联合国已经为世界减贫工作议定了新目标。中国也正在制定新的扶贫工作计划。中国政府已明确承诺，未来五年内实现 7000 万人口脱贫，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扶贫开发也不能再走粗放扩张、消耗资源的老路，而应当将可持续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不仅要考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总量账，更要算付出的成本账、环境保护账。中国将积极探索落后地区扶贫开发的新模式，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力争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脱贫致富的良性循环。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15 年减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实践也将为 2015 年后的世界减贫提供宝贵经验。

第三，京津冀应率先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实效。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示

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应将可持续性作为推动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聚焦于生态环境共建共保，重点在交通、能源、产业布局、城市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相互协调，提高效率，力争在 2020 年实现该地区可持续性方面的重大改观。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国，中美两国加强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合作，应该有更多的共同兴趣点、经验传授和商业机会。希望各位嘉宾能够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畅所欲言，为推动可持续性的经济转型献计献策。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谢谢！

建设专业化高质量社会智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魏礼群

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极为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从国际看，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处于持续的大变动大调整之中，可谓是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全球治理的新风险、新问题不断出现。这些正在并会继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从国内看，随着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战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实施，“五位一体”建设全方位推进，激发着一系列新的深刻社会变革；随着人类社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经济社会活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新情况和新事物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对治国理政和公共决策都提出了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新课题、新任务、新要求。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公共管理理论工作者必须着力推进公共管理创新研究，以更好地服务公共决策。无论是从世界智库发展的历程看，还是从发达国家智库作用的发挥看，智库都是决策者的“外脑”、“智商”。要服务好公共决策，必须加强公共管理新型智库建设，更好发挥智库对公共决策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建设新型高质量智库，特别是在高校办高质量的新型智库，需要从多方面下大工夫，敢于改革创新。这里简要谈以下十个观点：

一、全面发挥智库功能

无论办什么样类型的智库，首先必须明确智库的性质、定位和功能。中央文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一般说来，各类智库都应重视发挥六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是服务党政决策。根据党和政府的决策需求，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应用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进行决策评估，提出高水平、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积极建言献策，为决策提供依据和智力支撑。这是各类智库的首要职责。二是推进理论创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治国理政面临的难点、重点问题，提出有价值、有影响的新概念、新判断、新概括、新观点、新思想，为研判形势、谋划战略、制定决策提供科学理论或方法，推动理论创新、学术创新、方法创新。三是引导社会舆论。阐释党的科学理论，解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四是提供社会服务。接受社会有关方面委托的咨询任务，承担各类咨询项目，开展第三方评估，提供智力服务。五是参与公共外交。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加强与国外智库和有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六是培养输送人才。智库是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机构，汇聚了大量的高端人才，也可以说智库是人才库。智库出思想、出成果与出人才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智库是培养、造就治国理政人才的重要阵地，可以通过交流轮岗，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输送优秀人才。这六个方面都做到，很不容

易，但这些是建成高质量和高端智库不可偏废的，应当全面和正确地发挥应有作用。

二、突出服务公共决策

积极服务决策需求，主要搞好对策研究，咨政建言。这是智库研究的根本特征。各类智库都要适应党和政府的决策需求，主动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着力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真正发挥“外脑”和“参谋”的作用。当前和“十三五”期间公共决策中有许多理论和实践中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例如：第一，如何正确认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走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新路子，促进经济由超高速和粗放式扩张到实现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第二，如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解决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难点和“短板”问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确保完成既定改革任务；第三，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治理模式，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第四，如何深入研究我国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使各种决策权力相协调，并使权力、责任、义务相统一；第五，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创新政府监管、优化服务三者并举，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和公众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第六，如何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更加注重民生工作、更加注重生

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更加注重扩大公共服务、保障公民安全、社会安全等公共安全；第七，如何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打好扶贫攻坚战；第八，如何顺应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创新公共决策的模式、方法和手段，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第九，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既要更加对外开放，又要重视维护国家权益和安全；等等。要围绕决策需要，提出真知灼见和切实管用的建议。当然，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智库，可以对研究问题的范围、角度、内容提出不同的方案或建议。

三、着力提高研究成果质量

研究成果的质量是智库生存发展的根本。如何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我认为要抓住五个重要环节：一是把握方向性，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大局下思考、谋划、行动，这样拿出的成果才可能是建设性的、管用的。二是站高望远，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正确把握和运用发展规律，敢于出主意、早出主意、出大主意，做到先见、先知、先谋。三是以问题为导向，从实际问题出发，要善于观察问题，特别是要重视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的研究；四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求真务实。既要调查，又要研究，善于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五是运用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独立思考，揭示问题的本质，提出创新性、可操作的方案或见解。

四、充分展现自身优势

要找准各个智库的定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和长处。每

个智库都有自己的性质定位、专业领域、机构状况、队伍组成等方面特点。这就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善于对自己智库研究的领域作全面研究、系统研究、跟踪研究、长期研究，不断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切不可盲目追求大而全，或者对问题研究浅尝辄止。例如，在高校中办智库，就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实力雄厚，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着力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为决策咨询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支撑，并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服务公共外交。

五、注重成果多样性和转化应用

智库研究成果要注重应用性、对策性和时效性，不强求全面性、系统性，突出提供服务决策咨询的成果。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在高水平的质量上，还要体现在研究成果提供的时效性上。一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适时地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其价值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或者由于时过境迁，派不上用场。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就研究领域的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分期分批、多种形式、及时地提交有关研究成果。要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有些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内部刊物直接向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报送，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可以在媒体公开发表，可以通过举办论坛、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发布、推介研究成果，还可以出版系列研究报告。总之，研究成果不能只是束之高阁的厚本子，要有阶段性、时效性强的研究成果。要从各个智库实际情况出发，建立灵活有效的成果转化

化工作机制。现在，社会智库研究成果上报决策机关的渠道不够畅通，应积极帮助解决这方面问题。最好搭建供需双方的“直通车”。

六、创新组织机构形式

一般的科研机构、学校院系单位不是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智库以生产和输出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为主要任务，智库组织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高校新型智库组织的形式，既不能盲目地比附体制内官方智库，也不能简单地沿袭传统的高校院系机构。在高校中建设新型智库机构必须去行政化。智库的职能任务决定了其组织形式多样化，需要更加多元、自主、灵活、宽松的研究方式。在机构设置上，要推进不同类型智库发展由分散向集聚转变、从封闭向开放转变、从各自为战向联合攻关转变、从固定不变向流动组合转变。既要重视智库的形态建设，创建多形式的咨询研究机构体系，搭建多层次、高规格的研究平台，更要重视智库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应把智库作为单独实体设立，团队负责人和首席专家不受级别的限制，可以不占学校编制，采取智库职称晋升序列。在组织形式上，要最大程度地有利于思想火花的迸发，最大程度地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育。要围绕智库的主攻方向和研究优势，设置相应的多元孵化平台，并有利于与党和政府的政策需求进行有效对接。在高等院校办新型智库，还应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特别要注意创新学科和发展交叉学科。因此，智库组织体制和结构更需要创新。

七、搭建开放合作平台

传统的智库活动方式，偏重于独自、封闭运行。建设新型智库，

必须创新活动方式，实行开放型、合作型研究。项目和课题是智库运作的主要载体和平台，也是跨学院、跨学校、跨部门合作最为有效的纽带。要鼓励智库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开展合作，共同研究改革发展中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特别要鼓励高校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开展合作研究，以提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成果转化的及时性。高校智库要突出运用多种实证科学调查方法，建设基础数据库和信息库，收集和储存全面真实、详尽数据，形成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的研究成果。各类智库还要积极广泛开展与国外智库的合作交流，拓宽“请进来”、“走出去”的渠道。

八、改革评价标准和评价办法

建设新型高校智库，关键在于推进评价标准和评价办法改革。评价标准是智库的方向标和指挥棒。应该按照有利于发挥智库功能的要求改进相应的评价标准体系。要积极探索建立学术研究与智库成果之间有效的对接机制，有效处理学术、教学、科研与咨政之间的关系。要加快改革传统的单纯以学术论文、著作等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建立健全以应用研究为主和“咨政服务”为核心导向的资源分配、科研评价、职称晋升、业绩考核体系。这项改革的进程及其效果，直接决定智库建设的能力与水平。要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研究成果评价的主要标准。要建立以党政、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并以此来协调推进高校科研体制机制综合改革，构建有利于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根据新

型智库特点和发展需求，建立第三方遴选、后期资助、奖励淘汰机制。高校智库建设，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加快创新和畅通高校智库成果报送决策部门的渠道。否则，高校办新型智库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九、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智库建设的第一资源，一流智库的基础就是一流的人才。随着建设新型智库的兴起，智库人才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建设新型高校智库更应加快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使用体制，要建立智库人才引进和聘用柔性流动机制，同时建立良好的人才集成机制，把个体人才的智慧凝聚成智库整体优势。必须赋予高校智库机构更加灵活的人事自主权。一是建立灵活的选人进人机制。对于急需、紧缺型专门人才，要实行绿色通道制度；对于高端拔尖创新型人才，要建立快速直通车制度。二是建立有效的用人机制。探索多样化、多层次、富有战斗力的岗位设置体系，比如特聘岗位、兼职岗位、临时岗位等；建立健全有利于充分发挥领军人物和团队力量的纵横交叉的工作机制和平台；培育和发展智库生态文化和制度环境，让智库人员能够充满热情地、持续健康地、既富有合作精神又体现个性化地成长和发展。三是建立“旋转门”机制。健全高校内部智库机构、院系、校直职能部门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探索高校智库与各级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流动换岗机制。四是建立咨政研究骨干人才库。既要不断吸引和延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研究型、专家型的高素质人才，又要不断培养和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智库

专门人才。

十、注重打好智库研究的根底

打好智库研究的根底，就是要使研究人员练好智库研究的基本功。做好智库工作，需要从多方面提高素质和本领，而打牢基础性根底至关重要。包括：打好基本理论和政治立场的根底；打好把握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根底；打好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根底；打好撰写智库报告建议的技巧功底。这些根底是产生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性条件。如果智库研究人员不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不熟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就很难提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建议；如果智库研究人员不了解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现状，也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创新性和管用性的政策建议。智库研究报告与一般学术论文和学术成果的体例、范式和文字表达用语也不相同，不仅应当立论正确、观点鲜明，还应当文字明快、引人入胜、一目了然。

（来源：2015年10月23日《中国行政管理》）

以全面小康为目标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4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针对性强，即指明了方向，又提出了举措。全面落实讲话精神，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对于激发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克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习主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

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目前，城乡居民权益不平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权的不平等。城市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几乎已全部商品化，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厂房、设备、住宅等，都允许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而农村的土地、住宅等产权仍不明晰，农村对土地和房产等的法人

财产权仍不落实，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仍不能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因此，农民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化过程中不动产增值的收益。这是城乡居民基本权益上最大的不平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二是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尽管有 2.8 亿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农民工进城已二、三十年，但由于户籍的限制，他们享受不到城市户口所附加的各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绝大部分仍处于全家分离状态。从农民应有公民基本权益上说，这也是很不合理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提出“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三项改革是对农村土地公有制实现方式的重大突破，是对农民住宅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它第一次赋予农村土地和农民住宅以商品属性，明确了农户对自己的住房拥有所有权，农户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法人财产权，这为发挥市场对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为农民在城乡之间自主选择居住地和户籍，通过转让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获得财产性收入，打开了一扇大门。承认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法人财产权，与土地的私有化是截然不同的，同时解决了土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

效对接的问题。不折不扣的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就能在土地和房产的法人财产权上，使城乡居民拥有同等权益。

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重要体现。包括养老、教育、医疗、交通、供水、供电、环境等，农村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公共服务事业投入重点在城市，城市越来越漂亮，即使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与沿海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居民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由于公共服务的落后，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改变中西部农村公共服务落后状况，政府要把农村作为公共服务投入的重点，通过城乡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尽快弥补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欠账。近期应当把教育、医疗、交通、环保、养老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重点。要运用政府与企业合作（PPP）的模式来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业。沿海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比较好，主要在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很快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农村，主要通过自己增加投入，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帮助，把公共服务完善起来。中西部农村也必须走这条路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是城乡差距的集中反映。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是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最近几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速度超过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2009年的3.3:1缩小到2013年的2.5:1，令人欣喜。继续保持这一势头，从根本上说，要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又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目前，一个农村劳动力平均只能种 7 亩地，如果在单季农业地区能种到 100-120 亩，双季农业地区能种到 50-60 亩，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赶上社会平均水平，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职业。在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凭借承包权将经营权有偿转让，这样既可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又有利于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要鼓励发展各类合作经济，特别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商贸流通业和乡村旅游业。继续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现在沿海城市许多地方招工难，家政服务人员短缺，一个月嫂的月收入达五、六千元。一家两口人外出打工，年收入可达 8-9 万元，加上土地转包收入，家庭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左右，一下子就可赶上或超过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所以，只要创造一个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已不是遥远的将来，而是近在咫尺。

实现城乡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关键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消除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土地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应发挥市场对土地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其他要素不同的是，土地有一个用途管制问题。如果把耕地变为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并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已经明确，土地的占补平衡只能在省

域范围内进行。但至今只能在少数县域范围内试点。应当推广重庆的经验，重庆经验的核心是远离城市的农村退出的宅基地，通过全市统一设置的地票市场，也能分享到城市市区土地的级差地租。对于可能出现的占好补差问题，通过建立第三方的土地质量评估机构，加强土地质量的监管，可以妥善解决。如能创造一个城乡要素自由、平等交换的制度，实现城乡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平原、浅丘陵地区，用 5-10 年时间，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赶上沿海农民的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必须把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连在一起，同步推动。这三件事互相牵制，互相影响。农业现代化能够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潜力，为农用工业发展提供需求；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为建材工业提供巨大需求；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使 4 亿多离散人口实现全家团圆梦，形成城市建设的需求。抓好这三件事，必将激发出巨大需求潜力，成为未来十几年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并将迅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而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区间，到 2022 年前后使人均 GDP 达到 1.2 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作者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新立）

（来源：2015 年 9 月 10 日，中国经济网）

金砖银行与亚投行合作补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

昨天，金砖银行正式更名为新开发银行，并在上海开业。这背后更大的故事是，今年以来，中国全面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升级：中澳自贸区、中韩自贸区相继正式签约，除了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也陆续启动。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曾担任中澳、中韩早期首席谈判代表。他主持了开业仪式之后研讨会的首场讨论“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意义”。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指出，新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亚投行将互为补充，不是对现有国际规则(IMF、WTO、世界银行)构成威胁，而是对现有机制的改变、改善和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金砖新开发银行在开业之后，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魏建国：金砖银行更名为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制定新的5年战略。这意味着金砖五国在国际视野下合作，长远地共谋大业。从此，发展中国家有了自己的金融机构，这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之所以把名字改成“新开发银行”，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吸纳更多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

现在，新开发银行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需要解决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如何实现治理目标，应如何创新其组织结构，投融资机制和运营政策，实现效益最大化？如何建设新开发银行的知识功能？从

这个意义上说，新开发银行是对现有体制的补充，主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我觉得“新开行”也可以理解为“新知行”，因为这个组织将吸收更多的高端人才。可以预见的是，将有更多的国际组织、风险评估组织，以及上海自贸区内的机构参与进来。未来，中国也会有更多的人才进入国际组织，担任高级、中级、一般职务。

我们需要做好人才准备，主要包括管理人才、专业领域人才，以及多语言人才。

日报：新开发银行该如何与丝路基金、亚投行相互合作补充？

魏建国：与亚投行主要着眼于亚洲不同，新开发银行虽然有两个亚洲国家作为创始国，但是资金来自五个大洲，视野更广。丝路基金将超过 65 个国家、93 个港口城市的互联互通，但新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也不同，因为丝路基金还是由中国主导，但新开发银行是参与主导。

这三个组织都是要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国际资本参与其中，目的是形成人类利益共同体，因为共享主义将彻底改变人类命运。

新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亚投行建立的是同伴、同盟关系，并非结盟。非洲有句谚语，一个人能走得快，几个人一起走能走得更远。

通过金砖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形成的关系将逐步升级。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再到责任共同体。中国正在通过网相连，也即互联网、智能电网、高铁网达到互联互通，一步一

步向前走。

日报：今年以来，中澳自贸区、中韩自贸区相继正式签约，中美 BIT 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些与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是否有联系？

魏建国：所有这些事件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目前有能力建立、主导或参与主导更高水平的国际规则。

由于韩国的经济地位，中韩自贸区开启的是货物贸易开放，关税下降的幅度最大，种类和范围最广；中澳主要确立了服务贸易规则；而中美之间主要确定的是双边投资规则，今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将访美，中美 BIT 谈判预计很可能谈成。

可以预见的是，IMF 也很可能会在今年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应该可以为自己的货币提供信用支持。中国在未来，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金融政策领域，全面发挥积极主导作用。

（来源： 2015 年 7 月 22 日，第一财经日报）

[成果摘要]

《研究报告》2015年第43期：我国粮食库存现状、成因与建议

【摘要】我国粮食“十一连增”后，库存问题异常突出，具体表现为：粮食库存居高不下、产销区粮食库存严重失衡以及玉米等部分品种出现阶段性过剩，对国家粮食调控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需要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科学合理制定粮食库存水平，搞活储备粮食轮换与经营机制，优化粮食加工产业布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解决当前的粮食库存问题。

《研究报告》2015年第44期：增强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和的政策建议

【摘要】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资源环境“硬约束”不断加剧，增产能力不断逼近极限，社会经济利益失衡加剧，新型规模经营主体融资能力不足，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空间受到多重挤压，亟需加快优化政策调控手段，探索更科学的增产方式，加大新型主体扶持力度，以及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主产区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研究报告》2015年第45期：警惕货币政策“钝化” 落入流动性陷阱

【摘要】国民总支出水平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这种状况被称为“流动性陷阱”，“量化宽松”是经济出现“流动性陷阱”时的一种解决方式。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态势，我国货币政策在总体稳健中不断宽松，已出现较明显的“钝化”迹象。我国预算约束环境的改变是货币政策“钝化”的根本原因。考虑我国基准利率下调空间已不大，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作用有限，有必要也有空间通过降低当前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推动市场利率水平下行。

《研究报告》2015年第46期：中国应努力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加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在全面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中，我应着重处理好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大力倡导全球合作共赢新理念，更加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热点问题，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出更多中国方案，推进制定全球治理规则，推动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变革与逐步完善。

《研究报告》2015年第9期：我国地方债务管理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对策建议——我国地方债务风险评估与对策（下）

【摘要】我国地方债务面临三大风险：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风险规模较大，风险难以监控；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地方融资平台规范不足。加强地方债务管理，应从法理上明确地方政府债务的举债主体，分割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责任，妥善处理现有存量债务。对全国地方债务实行上限控制，根据各地区存量债务风险和财力状况差异分配各地方债务举债额度。发行市政债券或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选择多元化的债务负担指标，合理衡量地方政府短期和长期债务。

《研究报告》2015年第47期：我国农村市场现状、问题与制约因素

【摘要】农村市场存在巨大的开发潜力，是我国启动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的重中之重。经过多年发展，农村消费市场、要素市场与农产品市场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城乡市场二元结构仍然十分突出，大量要素交易仍需依赖非正式制度，“小农户”与“大流通”之间矛盾比较尖锐，使农村市场启动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智库言论》2015年第51期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第74期“经济每月谈”综述

【摘要】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74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演讲嘉宾认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应当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别较大，产业转型处于初级阶段，低碳能源转型面临严峻挑战。应当通过发展绿色投资、产业转型、节能改造、绿色交通、绿色消费，减轻生态环境压力，大力推广低碳能源等措施，推进环境健康、有活力和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

《智库言论》2015年第52期加快在东北实施自贸区战略以实现经济“浴火重生”

【摘要】东北经济全国垫底的核心症结在于体制机制制约。自贸区政策是东北经济冲破体制机制制约和“浴火重生”的最有效政策。在大连设立“全城自贸区”是打开东北经济僵局的“金钥匙”，对推行全国自贸区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

《智库言论》2015年第53期经济每月谈：中蒙俄 经济合作进程及展望

【摘要】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75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中蒙俄经济合作进程及展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中蒙俄经济合作处于最好历史时期，三国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文化上相通，战略吻合。应重点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积极防范中蒙俄经济合作潜在风险，消除意识对抗，强化经贸合作，将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巩固中俄大国协作关系，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平和质量。

[国际交流]

2015年8月24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孟加拉政策宣传与治理研究所所长 Syed Munir Khasru,商谈双方合作事宜。战略研究部、交流部陪同。

2015年8月12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外交学会举办的美亚学会第100批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访华招待会。交流部负责人陪同。

2015年8月18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就“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经济形势问题交换意见。交流部陪同。

2015年8月19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宴请，就建立中日企业家交流机制交换意见。交流部陪同。

2015年8月21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篠田邦彦，商谈双方合作事宜。交流部陪同。

2015年8月24-25日，魏建国副理事长赴日本，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负责人商谈中日企业家交流机制事宜。交流部陪同。

2015年8月5日，张永军副总经济师会见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大中华区总裁魏安德，就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及股市波动等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战略研究部、交流部、国经咨询公司陪同。

2015年8月10日，张永军副总经济师会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彼得·德莱斯戴尔教授，商谈双方“中澳经济关系与前景”合作研究课题事宜。交流部陪同。

2015年8月11日，张永军副总经济师会见韩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李渼妍，就中国经济总体情况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交流部陪同。

2015年9月9日，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会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董事总经理托马斯·梅尔（Thomas Maier）、董事总经理里卡尔多·普丽缇（Riccardo Puliti）等一行。

2015年9月10日下午，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会见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副馆长洪伟强（ANG Wee Keong）先生和二等秘书宋靖敏（Claire Soon Jing Min）女士一行。

通讯地址：北京市永定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050
联系电话：010-83362170 传真：010-83362176 网站：www.cciee.org.cn